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方克立摇著

长春出版社



自序

本书是我十年来关于现代新儒学和中国文化问题研究的文字的结合。

我过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和大多数中国哲学史学界的同仁一样，重点在中国古代哲学。十年前在一次座谈会上即席作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人们说：“这个意见很好，你就来做这件事吧”，后来就把我推到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的位置上。压上这副担子，可不同于在会上发几句议论、谈点个人看法，而是必须真抓实干，几乎是从零开始在中国大陆重新组织和推动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并且必须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如期拿出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来，才能对国家和人民有所交待。十年来主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任务，我本人也在这方面增加了一些知识，随着课题研究工作的进展陆续发表了一些文字。与课题组内其他同志深入的专人或专题研究不同，我关注的问题要宏观一些，涉猎较广而对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不十分深入，研究也缺乏系统性，这是自知其短的。但由于组织课题研究工作的需要，有些总体性问题甚至是涉及方向性的问题总得有人考虑，有人出来说话，这个角色往往只得由我来充任。所以，要从宏观上了解十年来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始终伴随着思想论争的复杂曲折进程，我的这些文字可能还记录和保存了一些对后来的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

我们一开始就意识到此一课题研究有着学术思想史研究和现实思想斗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课题工作是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组织开展的，所以比较注意系统地编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学术资



料,包括编“学案”和“论著辑要”,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较为深入的专人和专题研究。“课题组始终十分强调两点:一是要详细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意,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论,既不盲目崇扬,也不抹煞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①这种研究态度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不少港台海外学者的中肯评价,同时也受到了主要来自新儒家方面的批评。批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不满意我们强调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港台新儒家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看作是大陆新儒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认为“除非大陆学者能摆脱马列主义的教条和思想框框,他们对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将来中华民族的方向、历史运动的方向必然是彻底的唯心论”,也就是中国新儒家的哲学。继而大陆新儒家也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先定原则”和“门户之见”,认为“中国文化和新儒家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派那儿,是没有原则意义,没有体的层位的”,因而欠缺同情的了解,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他们把“大陆马列派”和“西方自由派”捆在一起来进行批判。新儒家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表示不能相容并采取了进攻的姿态。而在我们看来,要对现代新儒学这种思想文化现象作出正确的历史说明和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要坚持自信是正确的学术立场,把课题做下去并争取顺利完成,就不能对新儒家的批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必须作出回应,因而难免发生一些思想交锋。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这项工作我做的比别的同志要多一些,所以受到的批评也最多最直接最尖锐。这是不得已之事,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各种批评均不无教益,而且也是对我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的磨砺和考验。

一旦涉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才体会到为什么人们常说这项研究工作难做把它视为畏途,为什么“厚古薄今”的选择对学者来说相对比较安全较少麻烦。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本世纪的伟人毛泽东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②现代新儒学在近百年中国思想文化

① 《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丛书主编的话》。

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史中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所以此一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不容怀疑的,而且我们所采取的“聚集人材”、“分工合作”的研究方法也正符合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并已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件事情总得有人去做,不论是谁去做,它都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尽的历史责任。

现代新儒学研究课题是在 1949 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提出来的,它自然与回答和解决中国近现代文化讨论一以贯之的主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或谓古今中西问题(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是一个思想史研究的课题,而且这一课题研究本身就是直接参与文化讨论,成为文化研究和文化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每个研究者都要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从正面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在本世纪以来的诸多文化派别和文化观点中,我比较倾心于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论,认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可以简要地概括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也最适合中国的国情,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也是我近十年来关注和议论得较多的话题之一。我们和现代新儒家在文化观上的分歧,正是在于“综合创新”与“中体西用”的区别和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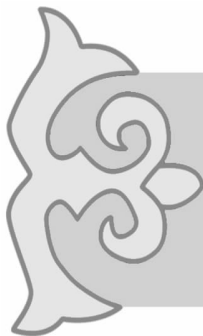
收入本书中的文字,据内容特征分为若干组。第一组是关于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综论性文章,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大体上可以反映十年来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基本进展情况,这些文章反映出我的认识也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深化过程。第二组是关于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著作的个案研究文章,大都是出席有关学术会议的发言,只涉及某些方面的问题,并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最后两篇是为了回答两位大陆新儒家学者 1982 年 1 月在武昌“徐复观思想研讨会”上对我的批评,阐明我们之间的思想分歧所在而于近期写成的,也属于个案研讨性质。第三组是为两套现代新儒学研究或资料丛书写的“总序”,以及为《孔子大辞典》写的有关现代新儒学的几个辞条。第四组是我近十年来参与文化讨论,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方针、方法问题所发表的一些个人意见,中心是阐扬“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批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有关文字也大都与现代新儒学研究有一定的联系。最后附录了几位同志写的访谈录,其内容和前面的文章是基本一致的,可以互相参证。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有几篇文章是我分别与曹耀明、郑家栋、李翔海同志合作完成的。他们曾是我指导的研究生,现在都已成为在现代新

儒学研究方面有多种论著出版的颇有影响的青年学者。有一套丛书“主编的话”是我和李锦全同志合写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一项集体劳动的成果。“附录”部分更是包含了访谈和记录整理者的大量辛勤劳动在内。盛家林同志的提议、催促和帮助,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促成了本书的顺利编辑出版。对于上述同志的合作与友情,我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方克立

1995年 12月 15日于望京医院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并有进一步发展和滋蔓的趋势,这就是复兴儒学或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

“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本来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个别学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第三期发展”解释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近年来,一些海外华裔学者先后应邀回国讲学,也有人大力宣传这种新儒学的主张(并非人人如此,也不见得是多数)。曾经是现代新儒家的先驱者的几位长期生活在国内的老先生,怀着对“周孔教化”和传统儒学的“敬意”,重登讲坛,继续宣传当年鼓吹过的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提倡发扬民族传统精神,甚至主张把宋明理学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这些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备受青年的尊敬和仰慕,加上报刊的宣传,因此,对于他们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学术观念的变化可能最能说明问题。近 10 年来港台现代新儒家著作中最常见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天人合一”、“道德理性”、“个体人格”、“儒家人文主义”等等,过去我们是很少讲的,近年来纷纷出现于我们的报刊上和学术论著中,甚至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和时尚观念。新儒学似乎已经成为现代学术思想战线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派别,尽管

摇摇* 摇本文是作者 1985 年 1 月 10 日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七五”科研规划咨询会上的发言,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85 年第 3 期。

目前国内还没有人公开打出“现代新儒家”的旗帜。

中国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个关键时刻,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重新泛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从历史上说,现代新儒家就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不要实现现代化和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学术思想派别,他们提出的理论,早已受到中国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肃批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和根本错误的。在今天,中国更紧迫地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古今、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直接、尖锐。中国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呢,还是应该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抑或是走如某些人所鼓吹的“东方式工业文明”或“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今天人们思考、探索和实际争论的问题。现代新儒家的主张在这个时候重新有了一定的市场,应该说是不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能不能靠复兴儒学,或以现代新儒学为指导思想来实现?自然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一般不会糊涂,但是在一些似乎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上,例如怎样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怎样评价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在今天的价值与作用,怎样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我们一些同志发表的见解,却很难和现代新儒家划清界限,有的甚至是径直地从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学著作中引进来的。这就容易在思想界造成混乱,特别是使一些青年同志在抽象的谈论中分辨不清是非。殊不知现代新儒家在上述“学术”问题上的观点和他们对中国前途的根本看法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现代新儒家作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战线上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我们过去对它没有做过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对“五四”以来的前期“新儒家”思想,研究成果已属寥寥;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港台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是现代新儒家的新的更重要的发展阶段,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论著,国内人士更鲜有所知,也极少正面接触和思想交锋。以致今天人家的一些思想观点传播、渗透进来,哪怕是在五六十年代泛滥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很新鲜,有的人还把它当作新发明奉献给国内读者。其实,只要翻一翻现代新儒家的前辈们在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些思想观点有许多并不“新”,不过是老调重弹或改头换面而已。我们的吃亏在于不太了解过去的历史情况,也不了解最近30年来港台和海外学术思想界的情况,所以难免认识不

清。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在日益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许多同志都深深感到,目前的这种状况亟待改变。我们要重视和加强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弄清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的诸阶段,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并且一定要把它放到中国现代思想斗争的总的潮流中来考察。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的认识当会更清楚一些。下面谈谈我的一些初步了解和看法。

现代新儒家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因为区别于先秦儒学的宋明儒学,在历史上被称为“新儒家”,所以把 19 世纪以复兴儒学为职志的这个流派称为“现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家”。先秦儒家,宋明新儒家,现代新儒家,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儒家学术发展的三个阶段。现代新儒家所致力的工作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工作。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的状况日趋恶化,“师夷制夷”的多次努力相继失败,这就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为了找到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就必须进行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改造,特别是要对支配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以打倒孔教迷信、提倡科学和民主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界非常活跃,出现了否定传统的全盘西化派,固守传统的保皇、保教和国粹派,以及各种形式的中西折衷、调和、会通派,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持续数十年的文化论战。现代新儒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对于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很重要的回应方式,即代表了在这个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折衷中西的一种努力。在一片西化声浪中,它勇于站出来维护传统,和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相比,它又并不绝对排拒西学。它表面上很“全面”、“公正”,实质上还是属于中体西用派,华夏优越论是其骨髓深处的精神支柱。这种中国本位的文化立场,比较容易为具有民族危机感而又不太了解世情的中国人在感情上所接受。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思想斗争的产物,它是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来维护传统、会通西学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学和西学都是有选择的。它所维护的是儒家伦理本位和心性之学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会通的也是现代西方的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等等。中国哲学

(包括儒家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它是视而不见,也不可能去继承和发扬的,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它又视若洪水猛兽,唯恐其深入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所以,在中国现代思想战线上,现代新儒家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反对、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一个思想流派。

现代新儒家自产生以来,至今已有近四多年的历史。随着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现代新儒家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它的前期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勱、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人。

梁漱溟在1924年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认为东西文化差异是“人生路向”上的根本不同,并以“意欲”向前、向后与调和持中为先验根据,将西方、印度、中国三大文化系统归结为三条不同的路向,认为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五四”时期反孔教、反儒学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就公开树起儒家旗帜,开始提倡新孔学,鼓吹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可以说,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最早的开启者和第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全民团结、一致抗日是当时最急迫的任务,复兴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成为空前响亮的口号,这又为现代儒学复兴运动带来一个大好时机。“九·一八”事变后,曾经在科玄论战中代表传统派(玄学派)的张君勱就写出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论著,其主旨无非是提倡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重振儒家学说,以配合国民党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出了《新理学》等“贞元六书”,公开声明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的。它的“新”就在于用西方的新实在论来改铸宋明理学,重造一个新形上学的系统。同一时期,贺麟则倡导新心学。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和中国的陆王心学相结合的产物。他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主张,系统地阐明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宗旨。熊十力早年是一个革命家,中年尝从欧阳竟无学习法相唯识之学,后由佛归儒,以大《易》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他又曾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治学主张“贵在会通”,“于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必不可偏废”,然而主要致力于建立中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提倡发扬儒家易理所显示的刚健精神。熊十力哲学在国内的影响本来并不大,但是由于他的一些学生在港台和海外广为宣传,近十年来,其地位被越抬

越高,已俨然成为前期“新儒家”的精神象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现代新儒家思想在国内已经没有市场。上面提到的前期新儒家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解放后多数留在国内,他们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有的经过学习和认真的自我批判,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学术上继续作出重要贡献。我们党也允许一些老先生保留自己的学术观点,例如,熊十力先生解放后还出版了《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梁漱溟先生也出版了《人心与人生》一书。

20世纪50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断绝薪火,而是在港台地区又得到了新的重要的发展,并且达到了它的鼎盛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人,他们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其中的唐君毅、牟宗三二人,年相若,早年都是熊十力的学生,在五六十年代,尤为推进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得力人物,在港台被称为“大儒”。

1958年元旦,张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人联名在香港《民主评论》和台湾《再生》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副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提出了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自此以后,他们分别发表了大量论文和演说,撰写了卷帙浩繁的著作,来宣传、充实、发挥、论证新儒家的理论。其中较重要的有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哲学原论》,牟宗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心体与性体》,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等。经过10年的努力,现代新儒家已经成为在港台地区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想派别之一,拥有众多的倡导者和信从者,并且与台湾当局倡导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相配合,通过在高中和大学开设《论语》、《孟子》等课程来进一步扩大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五六十年代,港台现代新儒家大力宣传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观点,可以简要地归纳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多、建设少,全盘否定了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亦不重视西方文化中的宗教精神,因此失落了文化中最高的精神理念层次;片面地提倡科学和民主,是有“术”而无“道”,结果陷入了空头民主和浅薄的科学主义。

二、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肯定中国文化中有一脉相承的“道统”存在，即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为一活的生命，它是客观的精神实体的表现，或者说，“历史文化是圣贤豪杰精神之表现”。因此，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就不能抱着“客观冷静的态度”去研究，而必须首先抱有“同情”和“敬意”，才能真正了解。

三、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儒家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理性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心性之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本原和核心，由此决定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是道德的形上学，只能通过道德实践才能对其有亲切的体认。儒家心性之学则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

四、只有在对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现代新潮的“适应”。儒家传统与科学、民主并不矛盾。中国古代就讲“正德、利用、厚生”，并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大平等精神，科学与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内在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由“内圣”（儒家心性之学）开出新“外王”（科学、民主），或谓之“返本开新”（返传统儒学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

五、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文化理想可以解决“后工业文明”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世界文化的未来，将是“儒学第三期之发扬”。西方人应该学习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智慧，诸如“天人合一”的宗教道德理想，成圣成贤的心性义理之学，悠久无疆的历史意识，天下一家的情怀，惻怛悲悯之情和“圆而神”的智慧等等。

现代新儒家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怎样把传统中国推向现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们首先强调必须认同传统文化，强调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只有畅通民族文化的本源大流，才能适应和消融西方的文化冲击。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挺立自家传统，融会西方新潮”，“承续儒家内圣之教，开出当代外王之学”。至于从儒家的心性之学怎样“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外王”事业来，现代新儒家的学者们还提出了种种理论，例如，有由“理性的作用表现”转为“理性的架构表现”之说；有由道德主体转出认知主体和政治主体，当其为认知主体和政治主体之时，则须暂忘其为道德主体的所谓“暂忘”说；还有知性（认知主体）是由良知（道德主体）自我坎陷而成的所谓“自我坎陷”说，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正如一位西方华裔学者所说的，都没有摆脱传统儒家的“道德主体优位性”立场，即把政治民主和科学知识的开发都放在儒家心性论的基础上。1956年“芦沟桥事变”前夕，中国哲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有人就曾预言，今后将要复兴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穷理尽性的唯心论大系统”。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

五六十年代对儒家心性之学的大力阐扬和对孟子、陆王心学的特别推崇来看,那个预言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现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在今天,其影响已远不止于港台地区,而是已经发展成为带有一定国际性的学术思潮,特别是在海外华人世界和长期受儒学传统影响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其影响均显著地存在。最近 10 年来,由于日本和所谓“东亚四小龙”(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在经济上超常的快速发展,人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深受儒学传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比亚洲其他受儒学传统影响较小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印度、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等)能够更快地在经济上起飞?儒家伦理对于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否并未成为阻力,反而构成一种助因?现代新儒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以此为事实根据,提出工业文明是多元的,应该有“东方式的工业文明”或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们还借助于所谓“韦伯理论”,强调宗教和伦理等意识形态能够对经济发展起正面的积极作用,儒家思想在现代还有巨大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现代新儒家都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有的还由政府出面大力提倡儒学,组织编写《儒家伦理》教程,指定为中小学生的必读课本,例如新加坡。另外,还有一部分海外华裔学者,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都保留着中国人的根性,难免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感到“孤寂”和处处不相契入,因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并且渴望中国文化的精彩、优越能够得到西方人士的了解和承认,以改善自身的生存处境。在这些人中,有的也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支持者,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学术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进入 1980 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年龄都已老化,有的已经故去,代之而起的是港台和海外的一批思想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大都是唐君毅、牟宗三的学生,受过良好的现代西方文化教育,知识赅博,思想开放,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组织里和学术会议上,已经形成一定的力量和势头。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赞成我们的开放政策,近年来多次回国讲学,在海内外学术文化交流中起了积极的桥梁作用。他们宣传的新儒学观点,我们虽不赞成,但是作为学术问题可以探讨和争论,在讨论中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一无变化的。在这些学者中,较为国内读者熟悉的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述先等人。他们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

以上简述了现代新儒家作为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

术思想派别,在本世纪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也附带说明了目前国内重新出现儒学热的外部影响即国际条件。当然,目前国内出现的文化研讨热潮,包括提高孔子、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的努力,并不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主要不是由于外来的影响,而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必然会引起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再估价,探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的思想运动,其中自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包括更多地肯定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在今天的价值和积极作用的观点。我们似乎还应考虑到,“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批孔批儒所引起的逆反心理,可能也是使孔子和儒家在今天地位上升的一个原因。然而,不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作多么高的估价,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方针,肯定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和主张“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现代新儒家毕竟还是有原则区别的。

古今、中西文化冲突问题将贯彻整个 20 世纪之始终。在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界,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强大的思想潮流之外,较有影响的和生命力较长久的,还有西化派和中体西用派。现代新儒家就是本世纪中体西用派的主要代表。它从 20 年代产生以来,至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预计到本世纪末以至下个世纪,还会有一定的影响。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这个流派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何况我们对它的研究就是对当前思想斗争的现实实际研究。

开展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在世的学者,和当前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也涉及到一些政策问题。它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要具有更加严谨的科学态度,详细占有资料,分析批判都要以理服人,更好地做到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像对待中国和外国其他资产阶级学术流派一样,对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思想和著作,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所包含的合理的思想成分,有益的思维成果,都应予以肯定并且虚心学习和借鉴。例如,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研究,试图由此找到一条更深刻地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哲学史研究更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的途径。而对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不但古代已有先行者,如宋代陈淳著有《北溪字义》,清代戴震著有《孟子字义疏证》;现代新儒家学者在这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唐君毅所著六大卷《中国哲学原论》,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专著。作者运用了某些近乎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中含义最广、运用最普遍的一些概念、范畴,如“道”、“理”、“心”、“性”、“命”、“太极”、“名辩”、“格物致知”等等,作了系统的疏理和详尽的阐释,引据资料相当丰富,对于我们

的研究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现代新儒家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把心性之学当做中国学术文化的本源大流,以孟子和陆王的心性论为正统,并吸摄融化了康德的“道德形上学”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的某些唯心主义思想,建构起心性哲学的系统理论。而我们过去对中国哲学中的心性论是重视不够的,不说没有人写出过如港台出版的大部头专著,就连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很少。这个情况启示我们,要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发展的真实过程,分清什么是精华和糟粕,对唯心主义也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中国哲学心性论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儒家心性论之外,还有佛教心性论和道家、墨家的心性论等等;儒家中除了孟子和宋明儒家的唯心主义心性论之外,还有荀子和王夫之、戴震等人多少带有唯物主义因素或倾向的心性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包括近代心理学在内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心性之学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正确说明道德的基础和本质、知和行的关系、真和善的关系等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现代学术发展的需要。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不是对我们也有启发和促进作用吗?

与现代新儒家的新道统论和中国本位(或主位)的文化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狭隘的宗派,而是以往人类文化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合理继承者和发扬者。我们十分重视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那些优秀的东西,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但是,由于立场不同,我们和现代新儒家对什么是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什么是糟粕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的,并且决不允许用传统来拖住我们的前进步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拒绝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他们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睁开眼睛看世界,对东方和西方各民族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近代先进的科技成就,均采取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态度,当然这同样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实行文化上的开放政策,就难免精华、糟粕一起进来,对于无所畏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并不可怕,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鉴别和取舍就是了,并且最后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对西方的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流派都采取开放的态度,更何况对在港台和海外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想呢!所以,现代新儒家思想传播、渗透到国内来,并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得到一定的流传,这也并不可怕。我们要加强对它的研究,首先就要了解它,把现代新儒家的著作找来读一读,仔细推敲和认真比较分析;了解、研究得深入了,把它的本质暴露出来,告诉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自然会采取正确的取舍态度。



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年来,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见诸报刊的论文不下十数篇,各种不同观点都摆了出来。“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已有10多个省市的数十名学者积极地投入了这项研究工作。今年10月,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学术讨论会,围绕着现代新儒家的定义(对象、范围)、产生背景、阶段划分、理论特征、历史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里,我想就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结合讨论中的各种意见,谈点我个人的看法。

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这项研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我们无意于也没有能力给“现代新儒家”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完善而准确的定义。但是,它首先涉及到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事实上由于对现代新儒家的概念和标准的理解不同,人们对哪些人是现代新儒家、哪些人不是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 拙本文是作者1985年10月15日在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曾引起热烈争论。不同观点见《理论信息报》1985年10月15日第10版、《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100页。本文原载《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又载《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有的学者认为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最典型的代表^①，有的学者则选择了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四人作为主要论述对象^②；有的学者认为方东美不是新儒家^③，还有的学者认为说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是现代新儒家是“不妥当”的^④。有的文章论述现代新儒学的演变，上溯到康有为、梁启超企图把封建儒学转换成资产阶级儒学的尝试；有的文章则把现代新儒家的上限明确地界定为“五四”以后，论述了它在近百年历史演进中的三个发展阶段；还有的文章着重评介了以余英时、杜维明为代表的当代海外新儒学的思想^⑤。总之，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定义、标准、范围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不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作为一个统一课题的研究工作就无法开展，至少在我们课题组内应该有一个基本上一致的意见。

经过讨论，我们得到了初步的共识，即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在界定现代新儒家时，不能不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学脉传承来说，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儒家，具有尊孔崇儒、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以继承儒家道统、弘扬儒家学术为己任等儒家的一般基本特征。他们有感于儒学在近代的衰落，怀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的使命感，力图上承孔孟程朱陆王之“道统”，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使儒学在当今得到“第三期之发扬”。所谓“第三期”是针对“第一期”（先秦儒学）和“第二期”（宋明新儒学）而言的，即是指现代新儒学的发展阶段。儒学发展三期论正是其道统观念之最明显的写照。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致思趋向和哲学观念上也表现出千差万别，但在尊孔崇儒、以儒家圣贤自命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这正是决定其为现代中国的儒家而不是墨家、道家或其他什么

① 李泽厚：《略论现代新儒家》，《文化：中国与世界》第 猿期。

② 刘述先：《当代新儒家的探索》，《传习录》第 缘期。

③ 陈鼓应先生持这种观点。

④ 张岱年：《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理论月刊》员愿年 第 员期。

⑤ 何新：《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再思考——评海外新儒学》，《社会科学辑刊》员愿年 第 圆期。

“家”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尊崇宋明理学是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精神取向。他们所理解的儒学的基本精神,其实就是宋明理学的精神,即以儒家心性之学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本源大流,强调以“内圣”驭“外王”,通过提高道德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现代新儒家的主流派(从熊十力到牟宗三)似乎是更重视宋明理学中的陆王心学一派,但却不能以是否推重陆王心学为绝对标准,冯友兰的新理学就是“接着”程朱讲的,方东美也更推重程朱理学,不能否认他们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有的学者如熊十力,曾宣称“余平生于宋学无甚好感”^①,但是他极力阐扬、绍述的“尽己性以尽物性”的“圣学血脉”^②,正是体现了宋明理学的根本精神。现代新儒学和宋明理学(新儒学)之同一个“新”字,一是指它们皆非简单地复归先秦儒学,而是表现了能够融合佛道以至会通西学的开放性;二是指它们都特重儒家“内圣”之学,不离“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思想路数。

(三)从时代特征来看,现代新儒家区别于先秦儒家亦区别于宋明新儒家,它是生活在 20 世纪的中国,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面临着迫切的现代化问题,其对应现实的方法是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为本位,来吸收、融合、改造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和文化,力图找到一条使传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较平稳的道路。它一方面认同传统文化,一方面迎接西方新潮,以适应时代需要。港台新儒家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所谓“返本”就是返传统儒学之本,所谓“开新”就是开当代科学、民主之新。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近代哲学和文化的影响,“援西学入儒”、“儒化(华化)西洋文化”是他们共同致力的工作,而且后来者在接受西学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四)从时间界限来说,我们认为现代新儒家思潮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它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也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力图适应现代、走向世界的一种努力。这个时间界限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是一致的,所以叫“现代新儒家”可能比称“当代新儒家”更确当一些^③。我们在考虑现代新儒家产生的文化背景时,自然不能忽略他们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① 熊十力:《乾坤行》,1955年自印本,下册第 507 页。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壬辰本,癸巳赘语。

③ “当代”一般是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海外称“当代新儒家”,虽然也提到梁漱溟、熊十力等前期代表人物,但主要是突出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港台新儒家的地位。